

论中国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黄群慧

[摘要] 本文梳理出了一个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逻辑和分析框架,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由于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构性矛盾而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问题所进行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可以拆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应“问题—原因—对策”逻辑线路,问题突出表现在“供给侧”,问题本质和根源是“结构性”矛盾,问题解决的对策是“改革”。本文认为,从经济结构视角具体划分为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来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可以实现理论性、系统性和现实指导性的折衷。本文从该视角入手,在归纳 2015 年和 2016 年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并进一步从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针对处置“僵尸企业”问题,降低制造企业成本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推进《中国制造 2025》和“互联网+”战略,推动“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战略,论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工业发展; 供给侧问题; 结构性矛盾; 改革政策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6)09-0005-19

“十二五”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新常态”特征日趋显著,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为 6.1%,是自 1992 年以来两个周期长达 23 年中的最低工业增速。2016 年上半年工业增速呈现缓中趋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为 6.0%。面对经济下行,经济“新常态”更需要主动适应和引领,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党中央提出的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战略任务和政策方向。“十三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关键是实质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形成工业强国建设的有效体制机制,加快实现工业增长新旧动能转换,从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再造工业发展的新生态系统。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逻辑与分析框架

要全面科学地分析市场运行,无论是从微观视角分析具体某个市场的运行,还是从宏观视角分析整体市场经济的运行,都需要从供给和需求这对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入手。因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

[收稿日期] 2016-08-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制造 2025’的技术路径、产业选择与战略规划研究”(批准号 15ZDB149)

[作者简介] 黄群慧(1966—),男,河北石家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博士生导师。电子邮箱:huang.q.h@263.net。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6)总论,发表时有删改。

经济内在关系的最基本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是使市场经济运行的力量。它们决定了每种物品的产量及其出售价格。如果你想知道，任何一种事件或者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你就应该优先考虑它将如何影响供给和需求”^[1]。虽然马克思将社会生产总过程划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辩证统一的环节来揭示经济运行的本质和规律，但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和消费的同一体性时也指出：“在经济学中常常以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来说明”^[2]，而且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对供给需求问题的研究是其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3]。正因为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经济的基本手段一般也被分为通过调节总供给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供给管理和通过调节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需求管理。围绕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众多流派的经济学家已经提供了复杂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从短期和长期、总量和结构、财政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等各个视角来区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及其相应的政策体系。但是，现实中一个国家要真正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基于基本国情、经济发展阶段、要素条件和面临的关键问题对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给管理政策进行动态相机选择、综合协同应用。

在经过 30 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逐步步入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基于对供给管理手段和需求管理手段的认识和经验，党中央提出了“十三五”期间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下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调控总思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主导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新概念，供给方或者供给侧问题被放在一个突出的地位。中国作为一个转轨时期的赶超型的发展中国家，在重视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平抑短期的经济波动的同时，其实经济政策的重心多年来一直是增加供给方面，产业政策被高强度使用，有关重视供给管理政策、加强产业政策的政策建议甚至可以追溯到 30 年前^[4]。只是最近的 10 多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日趋成熟，尤其是在 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对需求侧“三驾马车”调控力度和频度增大，对需求管理政策更加倚重^[5,6]。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背景下，再次强调供给侧，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放在世界经济长周期以及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背景下，还是置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逐步进入“新常态”的环境下，无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指导，还是根据西方经济学供应学派、制度经济学及新增长理论的启示，无论是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在供给侧看，还是从当前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看，无论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需要看，还是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有其不可争议的重大意义、必然性和迫切性。当然，强调供给侧、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的同时，总需求管理的价值也不能忽视，二者需要协同配合。尤其是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逆周期调节，不满足宏观调控手段所要求的可测量性、可控性和对目标的可预期，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以成为常态化的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7]。

虽然大家认同在当前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意义，但是，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内涵和政策含义的认识并不统一，理论界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的解读，而混乱的解读不仅会直接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十三五”规划的全面落实，还可能损失运用必要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稳定经济增长的机会^[7]。当前理论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混乱解读有两个倾向：一是“箩筐”倾向，无论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或者改革措施，都一揽子归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甚至一些刺激需求总量的短期政策也被归结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二是“帽子”倾向，仅仅将自己认可的某方面政策工具或者改革措施戴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帽子”，并标榜这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而不能全面联系地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例如，认为供给侧就是生产制造环节，或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核心是去产能、去库存，或

者只片面强调供给,而不能辩证地看到需求和供给的依存关系,等等^[9]。从严格的概念界定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突出了供给侧的问题,但还不完全等同于供给管理,要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有两个问题需澄清:一是关于“供给侧”。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学中几乎很少用“供给侧”这个提法,Supply-side Economics 直接翻译为供给学派经济学,或者供给学派,有分析认为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曾用过“供给侧”^[5]。但是,“供给侧”这个用法是恰如其分的,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供给方采取的政策措施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用“供给侧”既突出了问题的关键在供给方,又可区别于西方供给学派。二是关于“结构性改革”。西方经济学家往往把“结构改革”(Structural Reform)理解为针对无法用宏观经济政策解决的政府制度构架和监管构架问题而进行的改革,大致对应中国的体制改革,结构问题一般都是长期问题,结构改革会更多地影响供给要素,内容包括建立和完善更有利于创新的资本市场机制、发展更为富有竞争性和灵活性的产品和劳动市场、通过培训提高工人素质、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简化行政审批制度、鼓励创新和企业精神等,因此,结构改革本身就是与供给面联系在一起的^[8]。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的“结构改革”含义接近但又有所不同,否则也就没有必要再增加一个“供给侧”来重复。这里,“结构性改革”既包括“结构改革”的内涵,还包括产业比例结构、行业比例结构、区域结构等各种比例关系的调整等,即经济结构调整的含义,而使用“供给侧”这一前缀旨在强调经济结构中供给结构是主要矛盾所在。因此,“结构性改革”应包括供给结构调整和结构改革两方面任务^[10]，“结构性改革”更适合“结构调整+体制改革”的内涵。

面对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同解读,更需要准确把握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1]这个最权威的说明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给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原因—对策”典型的“三段论”逻辑线路:中国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为供给侧的有效和高端供给不足、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剩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低下,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构性矛盾,而产生这个矛盾的根源是体制机制问题束缚了生产力,因此,相应的对策是用体制机制改革的方法调整结构、化解结构性矛盾,最终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发展目标。也就是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由于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构性矛盾而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问题所进行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按照《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1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拆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应上面的“问题—原因—对策”逻辑线路,问题突出表现在“供给侧”,问题本质和根源是“结构性”矛盾,问题解决的对策是“改革”。具体可以通过以下概念逻辑和分析框架(见图1)来描述。

如图1所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构架下,从问题导向出发,可以通过由左至右和由右至左两个逻辑线来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问题的原因分析逻辑,二是问题的解决方法逻辑,前者回答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后者则回答了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背景提出的。2015年的经济形势被概括为“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和经济运行的风险概率上升”的“四降一升”,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无疑是前所未有的。面对中国经济的减速,无论是从中国人口红利视角,还是从经济结构转换视角,以及从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看,中国经济减速在更大程度上都要归结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而针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应该更多地从供给侧角度分析问题、把握政策着力点。“虽然在任何发展阶段任何时期,对宏观经济的需求侧扰动都难免

发生，但把经济发展新常态与短期冲击因素区别开，主要从供给侧而不是需求侧认识中国经济减速，是一个方法论层面要牢牢把握的关键”^[13]。也就是说，中国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四降一升”问题需要更多地从供给侧分析并给出政策建议，主要是通过对生产要素投入的管理来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以培育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当前经济运行主要表现出的问题是低端和无效产能过剩、房地产行业库存大幅增加、非金融企业负债和成本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和高端供给还存在“短板”等方面，这主要是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果。

供给结构的问题可以具体表现在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在企业层面突出表现为：企业素质结构不合理，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优质企业数量不够，造成生产要素不能集中配置到高效企业，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企业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企业改革和战略性调整还任重道远，企业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还有待建立完善；企业产品结构还无法适应消费结构变化，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能力不足，相对于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而言，企业生产成本还比较高。在产业层面突出表现为：国际产业链分工地位有待提升，产业亟待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升级；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够，产业中以重化工主导的资源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占比过大，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而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产业融合程度还有待提升，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水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水平都需要进一步提升。在区域层面突出表现为：一方面，中国生产要素在国内外配置还不合理，“走出去”程度与中国的发展需要还不适应，国际化程度有待提升，利用全球资源的区域战略还有待完善；另一方面，现有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生产要素区域配置还不能充分地利用区域比较优势，区域分工合理度可进一步提高，不同区域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有效流动还不能够实现，区域的制度供给还存在“歧视”。

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区域层面的供给结构问题，可以进一步溯源归结为生产要素结构性矛盾，或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需要改革。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驱动，甚至中国工业化进程被描述为低成本的快速工业化，基于低成本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要素所形成的企业和产业供给能力自然也主要是低端的。近年来，这种低成本要素驱动型增长动力结构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越来越难以持续下去。一方面，劳动要素新供给的数量在不断下降，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就业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每年都以二三百多万左右的规模在减少，同时中国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提高的速度明显高于主要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相对于美、日、德、韩等国的比例在2004—2013年期间提高了10%—15%左右^[14]；另一方面，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资本要素供给的数量驱动力量日趋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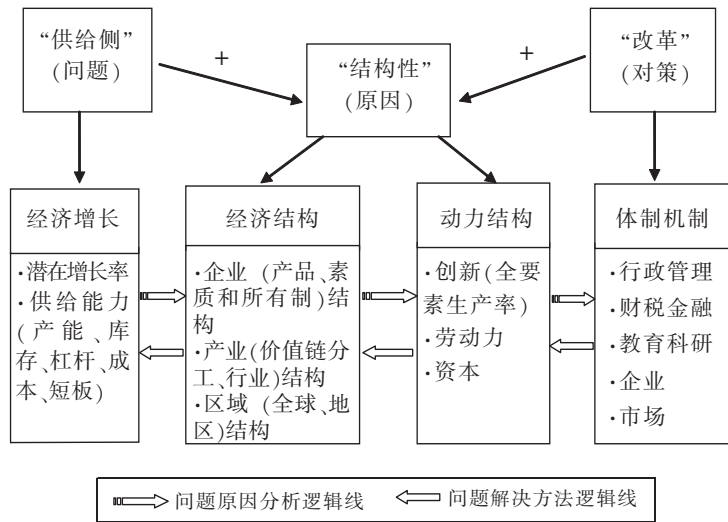


图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逻辑与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弱。据估算,2011年以来中国资本回报率呈大幅下滑的趋势,2011—2013年资本回报率分别为21.1%、16.6%和14.7%^[5]。针对工业资本回报率的估算表明,2002年工业边际资本产出率为0.61,2012年该值已下降至0.28^[5]。因此,面对要素收益递减趋势,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主要应该是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只有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一个模拟研究表明,2011—2022年,如果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99个百分点^[7]。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关键是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和通过技术创新优化生产要素结合方式。当前制约生产要素质量提升和技术创新的关键障碍是体制机制,包括政府行政体制、财税金融体制、科研教育体制、市场机制、企业体制等各个方面。因此,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也就非常必要,而这正是“结构性改革”的本意。

基于图1的示意,上面分析了“供给侧问题—结构性根源—结构性改革”的原因逻辑,回答了为什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问题解决的方法逻辑自然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化解结构性矛盾,进而解决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从而保证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这个逻辑勿需具体展开,但值得讨论的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如上所述,这里的“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意义的“结构改革”不完全相同,其区别在于“结构性改革”除了包括全面体制机制改革、改变经济动力结构进而优化经济结构的内涵以外,还包括直接对要素结构的调整优化,以及对企业、产业和区域结构的调整优化的内容,也就是说,对现有经济结构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直接调整和处置。这在图1中显示为“改革”方框既“下辖”“体制机制”方框、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动力结构”和“经济结构”变化,也包括通过“结构性”方框“下辖”“经济结构”和“动力结构”方框。这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两个可能的推进路线,一个可能的线路是政府通过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机制来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以及经济的企业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化解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矛盾,解决供给侧问题,提高供给质量,改善经济运行;另一个可能的线路是政府在现有的体制机制框架下直接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处置僵尸企业、化解产能过剩、用强选择性产业政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等。虽然有学者反复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制度的改革,“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不是政府调结构,不可与主要行政方式进行的“结构调整”混为一谈^[5],也就是说,学者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只能是第一个路线,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实现结构调整,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但是,从现实操作可能性看,近期各级政府可能更多地选择第二种方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许在一些学者眼里这本身并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我们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逻辑转为现实任务,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接针对的供给侧存在的问题简化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五大任务时,在现有的行政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下,各级政府短期内将更多地倾向于采用行政手段积极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虽然同时也会推进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但由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效果的不可控性,第一种推进线路被采用的可能和实施力度短期内不会太大。而且,在各级政府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核心任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很容易出现三种错误倾向:一是只关注产能过剩、库存高、企业负债高、成本高和存在基础设施短板等供给侧存在的问题本身,只就问题谈问题,而忽视了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因此,无法找到供给侧问题解决的根本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结构性”三个字十分重要,简称“供给侧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结构性”三个字^[4]。二是在“唯GDP”导向的遗留影响以及“保增长”的压力下,政府不愿意真心化解产能过剩,甚至以“补短板”的借口继续扩大属于过剩行业的产能。三是过于机械地理解“三去一降一补”,看不到这五方面之间的有机联系,缺少对经济工作的系统观,机械地将每项任务指标化,层层分解,最终有可能对当地经济

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基于图 1 所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逻辑和分析框架，至少可以从四个视角来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第一个视角是直接从经济运行中表现出来的供给侧问题入手，也就是从“三去一降一补”入手。这种视角可能更多地被政府部门实际操作时所采用，但如上所述，容易使人忽视供给侧问题的系统性及其结构性矛盾根源。第二个视角可以从供给侧的体制机制改革入手，尤其是强调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但由于这涉及的问题过于庞杂，包括行政体制、财税金融体制、企业体制、市场机制、教育科研制度等各个方面，因而从该视角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么“挂一漏万”而难以全面系统，要么面面俱到而难以具有深度。第三个视角则是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视角分析劳动、资本和技术创新等要素结构，往往宏观经济学更多地采用这个视角，其研究深入、学术性强，但一般停留在论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难以对政府部门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现实指导意义。第四个视角是经济结构视角，具体划分为企业、产业和政府三个层面来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这可以实现理论性、系统性和现实指导性的折衷。本文就从这个视角入手，在分析 2015 年和 2016 年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并进一步从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论述推进供给侧进行改革的重点任务，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从当前工业经济运行看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

进入 2015 年，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面临着“四降一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的突出问题，而这些问题主要反映在工业上。如果说，经济发展面临的“四降一升”问题正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那么，工业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

1. 2015 年工业增速呈现加速下行态势，是 23 年来的最低工业增速，2016 年上半年工业增速缓中趋稳，工业品价格、工业企业利润和工业出口都呈现了一些积极迹象，而在积极迹象背后隐藏着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回头的担忧

如图 2 所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增长大体可以划分四个波动周期，分别是 1978—1985 年、1985—1992 年、1992—2007 年、2007—2015 年。其中 1992 年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增速，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高达 21.2%，而 2015 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为 5.9%，是自 1992 年以来两个周期长达 23 年中的最低工业增速^[8]。如果按照经济学家最近热烈讨论的“L”增长轨迹，2011—2015 年规模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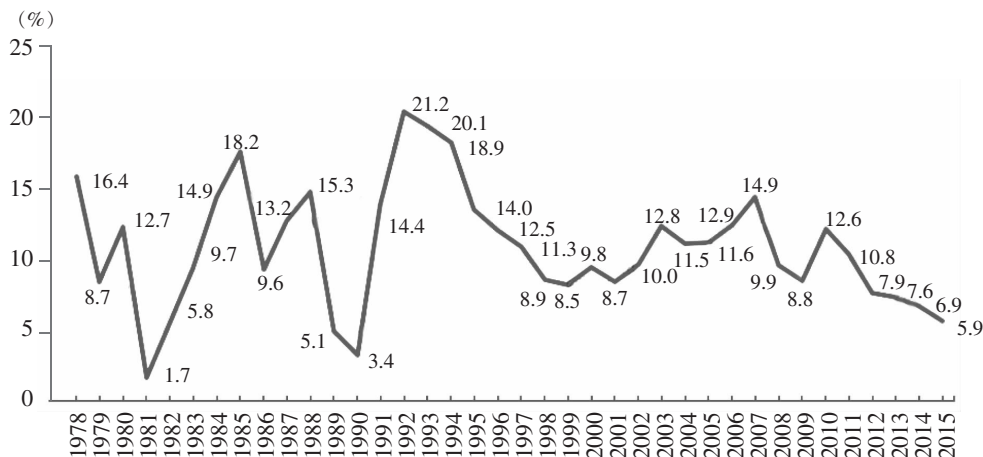


图 2 1978—2015 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绘制。

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 13.9%、10%、9.7%、8.3%和 6.1%，分别较上年下降 1.8、3.9、0.3、1.4 和 2.2 个百分点，大致可以认为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在整个“十二五”期间属于加速下滑的“竖线”过程。

2016 年上半年工业增速呈现缓中趋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为 6.0%，比 2015 年全年略低 0.1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季度增长 5.8%，第二季度增长 6.1%，第二季度比一季度加快 0.3 个百分点。从月度数据看，1—2 月、3 月、4 月、5 月、6 月和 7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 5.4%、6.8%、6.0%、6.0%、6.2%和 6.0%，3 月以来增速也趋于稳定，2016 年工业增速呈现缓中趋稳的态势。另外，从工业品出厂价格看，到 2016 年 7 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53 个月的负增长（如图 3 所示），但是进入 2016 年以后，PPI 降幅持续收窄，企业库存压力有所缓解，2016 年 1—7 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同比下降 5.3%、4.9%、4.3%、3.4%、2.8%、2.6%、1.7%，连续 7 个月收窄。5 月末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下降 1.1%，已连续两个月减少；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 14.9 天，同比减少 0.5 天（如图 4 所示）。再从工业企业盈利状况看，图 5 为 2011—2016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2015 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为 -2.3%。进入 2016 年以后，工业企业利润也出现转折，1—7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5235.9 亿元，同比增长 6.9%。最后从工业品出口看，2015 年中国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实现 118581.8 亿元，为负增长（-1.8%）。如图 6 所示，从 2015 年 4 月开始，中国工业出口同比增速连续负增长，但进入 2016 年后，形势逐步好转，2016 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55117 亿元，同比下降 0.7%，降幅比 2015 年全年收窄 1.1 个百分点，比 2016 年一季度收窄 2.3 个百分点；6 月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10491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2.3%，连续两个月实现正增长。

以上 2016 年的数据初步表明中国工业增长开始趋于稳定，但现在还不能判断已经出现拐点——工业经济步入“L”型轨迹的“横线”。这不仅仅是因为迄今只有 7 个月的数据支撑，更因为一些数据表明，中国上半年的经济趋稳，除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调以外，可能要更多地归于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回头趋势。2015 年年底以来，在金融政策的刺激下，房地产的价格、成交面积和投资等指标“疯狂”上升，进而带动以钢铁为代表的产能过剩行业复苏，一些停产但尚未关闭的“僵尸”钢厂也在恢复生产。数据表明，2016 年 5 月煤炭开采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5 倍、1.6 倍、32.1%，2016 年 3—6 月中国粗钢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2.9%、0.5%、1.8%和 1.7%，结束了自 2014 年 10 月以来持续负增长的状态（如图 7 所示）。4 月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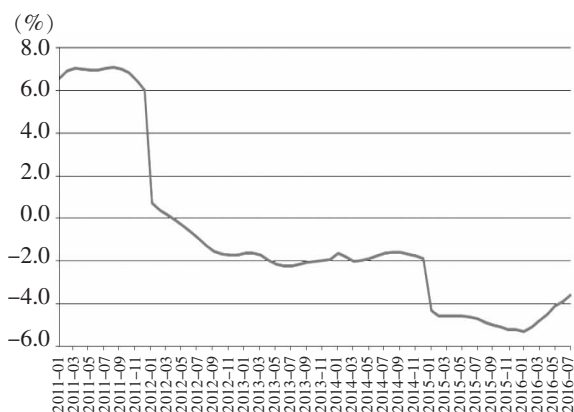


图 3 2011 年至 2016 年 7 月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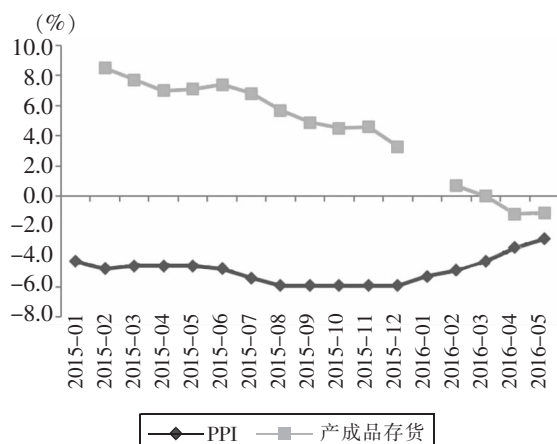


图 4 2015 年以来 PPI 和产成品库存增速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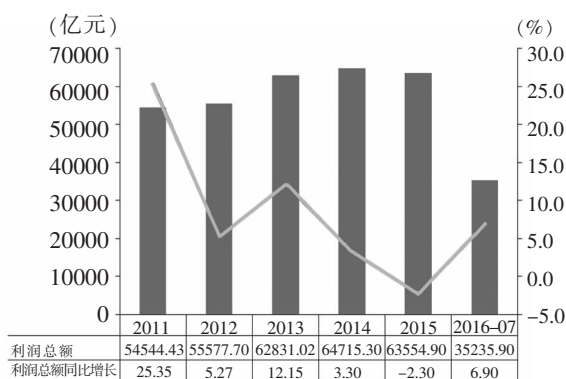


图5 2011年至2016年7月
工业企业利润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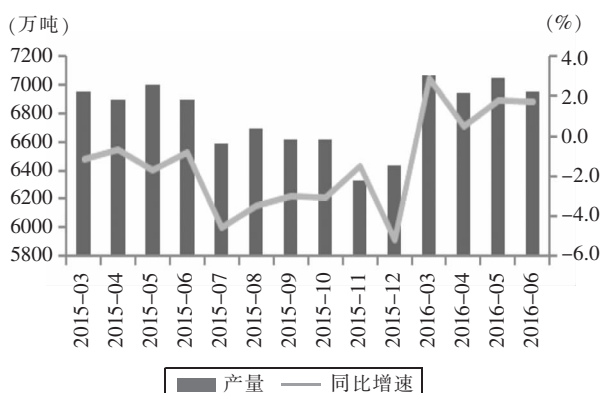


图7 2015年以来粗钢月度产量及
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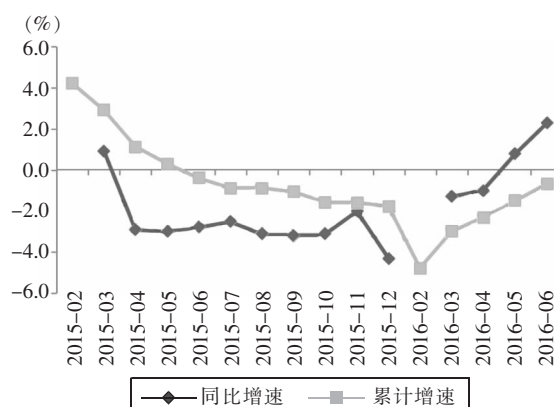


图6 2015年以来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和
累计增速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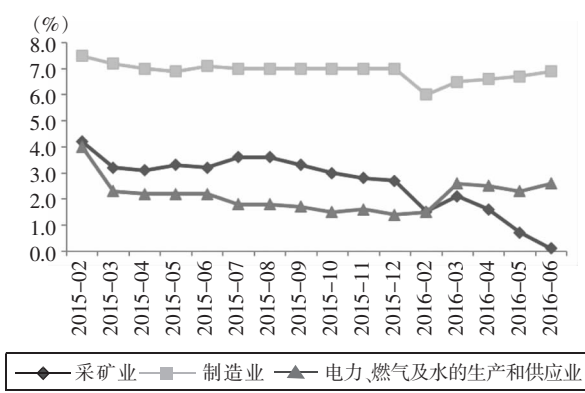


图8 2015年以来三大门类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绘制。

日均粗钢产量创历史新高,5月全国百家中小型钢铁企业中高炉开工率保持在85%以上。现在看来,没有一定的需求侧刺激,工业增速会下降过快,经济和社会都可能由于下行压力过大而难以承受。但不是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潜在工业增长率而形成的增长则是不可持续的,还可能给未来经济运行埋下更大的风险,工业政策要在稳增长与调结构、短期与长期、适度扩大总需求和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艰难地寻求平衡^[18]。

2. 2015年工业行业结构分化特征明显,2016年上半年结构继续呈现高级化发展趋势,但强选择性产业政策可能引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问题需要警惕

从工业三大门类看,2015年制造业增速远远大于其他两大门类,工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的分化趋势明显。2015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增长7.0%,采矿业增长2.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4%。其中,制造业中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2%,比规模以上整体工业增速快4.1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从2014年的10.6%提高到为11.8%,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而同期采矿业占比从11.0%下降到8.6%,六大耗能产业占比从28.4%下降到27.8%。2016年上半年继续保持了这种趋势,制造业增长6.7%,采矿业增长0.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2.6%(见图8)。尤其是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同比分别

增长 11.0%、10.2%和 8.1%，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 5.0、4.2 和 2.1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为 12.1%和 32.6%，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 0.7 和 1.2 个百分点，工业结构高级化的趋势十分明显。

从行业结构看，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一些高技术及其相关行业和一些经济下行时的逆周期性行业（如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在 2015 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速，而一些资源开采、原材料产业下滑十分严重，例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下降 32.6%、14.8%和 20.7%，利润则分别下降高达 74.5%、65.0%和 67.9%^[18]。总体而言，41 个工业行业中技术密集型行业增速相对较快，体现了工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汽车、医药表现抢眼，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和新材料等相关产品迅猛发展。

但是，值得高度注意的是，近几年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的新能源汽车增速过快。截至 2015 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无论是当年产量还是累计产量，均排名世界第一，2009—2015 年中国累计生产新能源汽车已占到全球 30%，2016 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高达 88.7%^[19]。在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超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对新能源汽车的强补贴政策以及对传统能源汽车歧视限购的双方挤压而对需求的扭曲。在为新能源汽车迅猛发展欣喜的同时，其背后的强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推手更令人担忧。一方面，从全生命周期角度看，现有技术新能源汽车的综合污染程度是否比传统能源汽车低，还有很大争议；另一方面，必须警惕由此而可能产生的竞争无序和新的产能过剩问题。

3. 从工业增速看，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的协同程度不断提升，但由于主导产业增长分化而导致的新的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日益突出，新区域协同发展战略需要加大推进力度

“十一五”以来，多年改革开放形成的东、中、西三大区域差距逐步缩小，中西部工业化进程加速。2015 年和 2016 年上半年延续了这种趋势，2015 年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快于东部地区 0.9 和 1.1 个百分点，2016 年上半年

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中部地区增长 7.3%，西部地区增长 7.2%，中西部地区继续快于东部地区接近 1 个百分点（如图 9 所示）。但是，一些地区因主导产业为采掘、重化工制造业而高技术产业占比低，引起地区工业及其整个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包括东北地区、山西和河北等，这些地区近两年经济增速都列全国倒数几位。从东北地区看，在“十二五”初期，东北三省工业增速基本是高于或者等于全国工业增速，2011 年吉林高于全国水平 4.9 个百分点，辽宁高于全国水平 1 个百分点，黑龙江略低于全国水平 0.4 个百分点。2015 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 -4.8%、5.3%、0.4%，均低于全国平均增速 6.1%，2016 年上半年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5%，继续负增长。从山西看，因以煤炭为主导产业，受到“资源诅咒”的影响，近几年山西经济增速下滑明显，2015 年山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 -2.8%，2016 年上半年为 -1.5%。从河北看，因为钢铁产业作为河北工业支柱，受产能过剩的影响，河北工业持续低迷，“十二五”期间，河北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从 16.1%下降到 4.4%；而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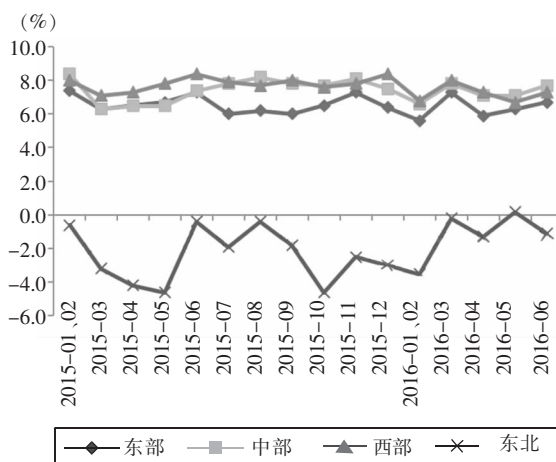


图 9 2015 年以来四大区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绘制。

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9.3%，高于全国3.2个百分点，更是与河北相差4.9个百分点。2016年上半年因钢铁复苏这种差距略微收窄，但从京津冀协同发展角度看，绝对差距还在扩大。面对“十二五”期间出现的新的区域发展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亟待加大推进力度。

4. 工业呈现出的增速显著下行、行业和区域结构分化的经济“新常态”特征，以及当前工业运行中面临的产能过剩顽疾、制造业投资增速回落、民间投资意愿大幅下滑、累积债务风险日趋增大等突出问题，表明工业经济亟待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当前中国工业运行中的增速显著下行，以及一些地方的工业“塌方式”下降，实际上还是结构性原因，工业行业结构分化特征也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和说明。一方面，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增速高于总体工业增速，但是产业规模还不够，在整个工业中所占比例还不高，经过几年的快速增长，2015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也只有11.8%，因此，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一些原材料、重化工产业在整个工业中规模还很大，2015年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及炼焦、化工、电力六大耗能产业增加值占比仍有27.8%，当这些产业因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而出现断崖式下降时，会对整个工业增长带来巨大的下行压力。虽然现在中国工业已经呈现出结构优化、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但这种转换的速度和力度还远远不够，这种新动力“增少”、旧动力“减多”的动能转换格局必然影响整体工业的增速。可以预计的是，这种趋势在2016年和2017年还会继续下去。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的模型预测，2016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降至5.5%、2017年6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降至5.0%的概率很大。因此，对于工业而言，通过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增长新动力、实现工业增长动能转换的确非常必要和急迫。不仅如此，如上所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包括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回头趋势、强选择性产业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常成长的“破坏效应”初现、一些区域工业发展大幅度下滑，都意味着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另外，2016年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中还出现了工业投资明显放缓、民间投资大幅度下滑以及债务风险加大等新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表明一些关键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不够。一是工业投资明显放缓问题。2016年上半年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101702亿元，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一季度回落2.3个百分点，尤其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3.1个百分点。在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大背景下，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中国制造2025》、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回落，其影响不仅仅是工业转型升级，更为重要的是会影响未来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培育和新经济的发展。二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下滑问题。2016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同比增长2.8%，增速比全部投资低6.2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比重达61.5%，比上年同期下降3.6个百分点。2016年3月开始，第二产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成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的主导力量。虽然民间投资下滑有多种原因，但不容置疑的是，很多体制机制原因影响了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尤其是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形成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亟待推进。三是债务风险问题。政府一直非常关注企业债务风险问题，并努力降低财务杠杆风险，但2016年债务风险还在加大。2016年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8%，较2015年12月提高0.6个百分点；到5月末，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同比增加8.6%，增速比1—5月主营业务收入高出5.7个百分点，1—5月应收款平均回收期39.1天，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3天^[19]。这意味着“降杠杆”的任务还有待强化。

总之,从工业运行角度看,面对当前速度下行的压力,要实现工业经济增长的筑底成功,实现健康、可持续的“L”增长轨迹,关键是实现工业增长动能转换。随着人口红利快速消失、企业制造成本不断上升、资本边际回报逐步下降,中国工业增长的主要源泉必然是提高工业生产要素质量和创新工业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机制,这正是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有之义。如果借用生态经济学的表述,这种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推进工业增长动能转换,实际上就是再造一个工业发展的新生态系统,这个新工业生态体系由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紧密相连的子系统构成,系统运行的核心是提高工业创新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新工业生态体系与原工业生态体系的关键区别是具有更高的创新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工业增长方式从劳动力和物质要素总量投入驱动主导转向知识和技能等创新要素驱动主导,适应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根本需要^[21]。

三、推进企业层面的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企业层面的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国企业素质结构、企业产品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还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问题,在当前和“十三五”时期,需要面对的关键任务是处置“僵尸企业”、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创新发展环境。

1. 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提升中国工业企业整体素质,形成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

“僵尸企业”(Zombie Company 或 Zombie Firm)一般认为是已经不具有自生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市场出清,主要依靠政府补贴、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或借债而勉强维持运营的企业。“僵尸企业”的定量鉴别十分复杂,学术界定量分析界定“僵尸企业”的标准包括:一是扣除非经常损益后每股收益连续3年为负数;二是企业获得的贷款利息率低于正常的市场最低利息率或者最优利率;三是实际亏损、负债高但借款总额高于去年,或者综合采用这些标准^[22]。从处置“僵尸企业”看,政府一般还要考虑企业是否符合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是否资不抵债,是否处于产能过剩行业,是否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由于标准不同,实际上,实证研究中国现阶段有多少“僵尸企业”比较困难。近两年来,受经济增长放缓、产能过剩问题加剧、市场需求疲软的影响,许多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而市场又不能自动出清,形成了众多的“僵尸企业”。中国现阶段的“僵尸企业”大多分布在产能过剩的行业,既包括处于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能绝对过剩行业中,也包括存在于光伏、风电等产能相对过剩行业中。从所有制结构看,“僵尸企业”大多属于社会包袱重、人员下岗分流难度大、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的国有企业。“僵尸企业”的成因较为复杂,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所处生命周期、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是重要的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说,当前“僵尸企业”的存在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过度保护、产业政策选择性过强,使得市场无法快速出清而造成的。“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会降低资源使用效率,恶化市场竞争秩序,加剧金融风险,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虽然“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会引起上述风险,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僵尸企业”都应被淘汰。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00年代早期,日本“僵尸企业”中的大部分并没有破产或退市,而且大部分存活下来的“僵尸企业”的绩效在近年来还有了显著的提高。“僵尸企业”情况千差万别,切忌采取“一刀切”的处置办法,而应全面分析企业经营困难程度、成因和未来发展潜力,以此为基础,抓住重点、分类化解、精准施策,协调推进。一是全面评估。对具有资产负债率高企、无法准时偿还银行到期利息、纳税额明显减少、用电量明显降低、拖欠职工工资等特征的企业进行重点排查,委托专业机构对“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和发展潜力进行评估。二是要精准处置。根据“僵尸企业”情况差异,清理退出一批、兼并重组一批、改造提升一批。对落后、绝对产能过剩产业和衰退产业中长期亏

损和停产的企业要加快清理退出,对主要由于管理水平落后、暂时性的产能过剩而出现亏损但企业技术装备水平较高、产业发展前景长期看好的企业重在兼并重组或者改造提升。三是要协调配套推进。具体包括创新金融手段和工具,推进金融体系改革与处置“僵尸企业”相结合,通过市场化的多种融资手段支持“僵尸企业”在市场出清;完善社会政策,促进社会政策与“僵尸企业”破产政策相协调;健全法律制度,更多地依靠法律手段推进“僵尸企业”的破产、兼并、重组;转变产业政策,纠正不恰当的财政补贴等市场扭曲行为,实现从强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的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引进民营资本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民营企业对“僵尸企业”中的优质资产进行兼并重组^[23]。

2. 有效降低制造企业成本,提高制造企业国际竞争力,形成有利于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之本,实体经济中制造企业是主体。当前,中国经济步入工业化后期并呈现出明显的服务化趋势,2013年中国服务业占比超越工业成为第一大产业,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超过50%,经济“去实体化”的内在结构演进风险在不断加大。更重要的问题是,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畸形增长严重抑制了制造业的正常健康发展。麦肯锡2016年一份针对中国3500家上市公司和美国7000家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利润80%由金融企业拿走,而美国的经济利润只有20%归金融企业^[24]。当前制造业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已主要不在于通过提高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来吸纳就业和提高经济增长率,而在于制造业对于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决定性作用。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技术创新的使用者和传播者。但是,由于大量的资源流入到房地产业,制造业的创新活动受到了很大抑制。研究表明,那些房地产投资增长越快的省份和地区,其创新投入和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增长率就越低。中国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贷款期限结构的偏向效应,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形成了更为突出的抑制^[25]。再加上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挤压和新兴经济体低端挤出的国际竞争格局,在这种背景下,制造企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越来越严峻,生存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制造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逐步增多。

在众多制约制造业健康发展的因素中,成本快速上涨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一份研究表明,在中国除了小时人工成本低于主要发达工业国外,养老保险费用、土地成本、能源成本、税收成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都相对高于主要发达工业国,而平均工资也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东南亚国家^[26],这也表明中国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制造企业成本的空间还很大。因此,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要围绕降低实体养老保险、税费负担、财务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各个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出台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营造有利环境,鼓励和引导企业创新行为。2016年8月8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在方案中提出,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具体包括六个方面的目标:一是税费负担合理降低,年减税额5000亿元以上;二是融资成本有效降低,企业贷款、发债利息负担水平逐步降低,融资中间环节费用占企业融资成本比重合理降低;三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明显降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综合措施进一步落实;四是企业“五险一金”缴费占工资总额的比例合理降低;五是能源成本进一步降低,企业用电、用气定价机制市场化程度明显提升,工商业用电和工业用气价格合理降低;六是物流成本较大幅度降低,社会物流总费用占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由目前的4.9%降低0.5个百分点左右,工商业企业物流费用率由8.3%降低1个百分点左右。应该说,这些目标和措施都已经十分具体,但关键还在落实。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2016年中国企业500强报告指出,在全国大力减

税大背景下,500强中的490家可比企业2015年综合税负(纳税总额/营业收入总额)为7.18%,而2014年同口径企业综合税负为7.01%,企业税收负担反而加重。因此,关键不是通过3年方案来降低多少税收负担,而是是否形成有利于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尤其是,必须下决心彻底扭转资源“脱实向虚”的倾向,在金融业长期“暴利”、房地产价格“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环境下,制造企业就难以吸引资金要素、高素质劳动力等资源支持,企业创新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制造企业也就没能力提供多品种、高品质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高端有效供给也就无从谈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也就无法达到。还应指出的是,成本高低是相对的,2005—2010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年均增长了22.8%,但同期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速分别为22.9%和29.1%,这个阶段企业会感觉成本负担不是很突出;而2011—2014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主营业务成本年均增长了12.7%,虽远远低于2005—2010年的平均增速,但是同期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速分别为12.2%和6.5%,企业反而会感到负担十分沉重^[26]。因此,直接出台措施降低企业成本,只属于是临时给制造企业松绑,长期看还必须建立有利于制造业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3. 实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产能过剩行业和自然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有突破性进展,建立有利于各类企业创新发展、公平竞争发展的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战略部署,明确了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任务。在经过了近两年的探索后,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进展,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下发。之后,相应配套文件陆续发布,深化改革的主体制度框架初步确立,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1+N”指导政策体系正逐步形成。但是,在实践层面的实质推进还只是在局部地区或领域起步,国资国企改革总体进度相对较缓,改革系统性、针对性、时效性不够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改革阻力克服路径还有待进一步明确,试点进展还不均衡,改革动力还有待进一步培育,社会感知的改革效果还不显著,国有企业改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改革的联动性有待进一步增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国有企业自身的发展,还在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的市场化环境。当前,中国整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发力,无论是从整体经济发展需要看,还是从国有企业自身改革发展看,实质推进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都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实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以国有企业功能分类为基本前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新阶段,可以认为是“分类改革”阶段。根据党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国有企业可以分为公益类、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以及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将会有不同的国资监管机制,混合所有股权结构中的国有持股比例要求不同,企业治理机制也有差异。由于现有的国有企业没有明确其具体定位,大多是三类业务混合,因此,需要推进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来实现企业功能定位和分类。实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首先对每家国有企业进行功能定位和类型确定,并向社会公布,这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当务之急^[27]。

(2)实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整体协同推进的基本原则。新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实质推进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各项改革任务和政策措施的协同性。无论是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和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还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以及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这些改革任务都不是割裂的,在具体推进过程中需要注意其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因此,“十三五”时期应该根据经济新常态的要求对国有经济布局有一个整体规划。在政府部门推动开展国有企业改革试点的过程中,各项试点也不应该是对一个企业单向

推进,而应该将试点企业作为一个综合改革试点^[27]。

(3)实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努力在两个领域实现突破。这两个领域分别是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和石油、电信、电力、民航、铁路等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这两个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对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支持“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第一个领域的改革涉及化解产能过剩、处置“僵尸企业”和国有经济在这些行业的逐步退出等难点和重点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任务,能否成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有经济布局的优化和整体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全局战略意义。第二个领域的行业大多是基础性行业,对整体经济效率影响巨大,其改革能否成功推进,对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以及下游产业的成本降低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这两个领域取得突破,是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十分重要的内容^[27]。

四、推进产业层面的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产业层面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目标是要进一步推进工业转型升级,推进工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工业价值链条高端化。当前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从产业层面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任务是化解产能过剩和积极推进《中国制造 2025》战略“双管齐下”,实现工业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1. 把握新常态下产能过剩的新特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主要利用市场手段积极推进工业的“去产能”

对于步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工业,化解在工业化中期所积累的庞大工业产能,无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产能过剩不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新问题,多年来政府已经多次推进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至今,国务院和各个相关部委已经出台 19 个针对产能过剩的文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关于产能过剩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必须清楚认识。一是当前的产能过剩具有长期性和绝对性的新特征,因为本次产能过剩所涉及的主要行业及许多产品的需求峰值已经或即将到来,未来需求增长空间已极为有限,很难再出现新的需求高峰将过剩产能消化掉。因此,现在的产能过剩会是长期的和绝对的,必需有充足思想和战略准备。二是化解产能过剩必须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对过剩产能实现市场出清,这是当前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重中之重。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出五方面要求来加大推进“去产能”,包括加强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更为注重利用市场机制、采用经济手段、法治手段来化解产能过剩,加大政策力度积极引导过剩产能主动地退出,营造良好市场条件与氛围,要以煤炭、钢铁等行业为重点突破。从中可以看出对发挥市场机制“去产能”的强调。2016 年 2 月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再次强调要通过市场倒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用法治化和市场化的手段化解过剩产能。从供给侧改革要求看,当然要充分依靠市场手段“去产能”,但是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完成压缩产能的指标难度比较大。2016 年 1—7 月全国 28 个产钢地区和中央企业累计压缩炼钢产能 2126 万吨,完成全年任务的 47%;而煤炭“去产能”完成 9500 万吨,仅完成退出产能任务 2.5 亿吨的 38%。2016 年上半年,由于煤炭、钢铁需求复苏,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本身,都没有更大的积极性来压缩产能。还有一些地区以“补短板”为借口,继续扩大产能。因此,针对具有长期性和绝对性过剩的特征,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去产能”还任重而道远。

2. 积极推进《中国制造 2025》,大力发展新经济,加快培育工业经济增长新动能

当今世界正在步入新一轮科技革命拓展期,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产业化进程加速推进,新的

产业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层出不穷,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增长的新要素、新动力和新模式不断壮大,“新经济”浮出水面。所谓新经济,其本质是由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动新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活动,表现为人类生产方式进步、经济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与发展。新经济的技术革命基础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新一代通信等信息技术为主,还包括智能机器人、增材制造、无人驾驶汽车等智能制造技术,以及纳米、石墨烯等新材料技术,氢能、燃料电池等清洁能源技术,基因组、干细胞、合成生物等生物技术。新经济既表现为基于这些新技术产生的各类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还表现为传统产业与新技术融合发展。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信息(数据)独立流动性日益增强而逐步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独立投入产出要素,进而增加了信息边际效率贡献信息(数据);二是以“云网端”为代表的新的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三是生产组织和社会分工方式更倾向于社会化、网络化、平台化、扁平化、小微化,从而适应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进一步拓展了范围经济作用,进而成为新经济的效率源泉。

在当前中国工业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产业结构分化、工业经济增长动能亟待转换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新经济既是积极应对新产业革命挑战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资源配置的战略要求。虽然当前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面临巨大经济下行压力,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赶上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以及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2015年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是中国努力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大力发展新经济、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提高工业供给质量的一个核心战略。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实施《中国制造2025》,应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完善技术创新生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是提高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一个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研发资金和人才投入等要素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创新要素之间、创新要素与系统、与环境之间动态关系优化,即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改善。因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制造业创新生态对提升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具体要求深化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修补制造业创新链,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构建制造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开放协同性;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的“生态位”,提高中小企业制造创新能力;加强各层次工程技术人员培养,提高技术工人的创新能力^[28]。

(2)构建科学的政策机制,落实《中国制造2025》。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一定要坚持功能性产业政策主导,避免强选择性产业政策,要强调通过支持建设广义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物质性基础设施、社会性基础设施和制度性基础设施)来推动和促进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维护公平竞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从而完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进而提升整个产业和国家的创新能力。

(3)加强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本培育,加大“云网端”基础设施投资。一方面,要深化教育、科技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围绕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钻研精神奖励、创新导向激励、职业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建立完善相应的激励制度体系,逐步引导培育产业工人的精益求精的行为习惯,最后形成超越制度的、体现为“工匠精神”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29];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大数据、云技术、超级宽带、能源互联网、智能电网、工业互联网等各种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弥补中国智能基础设施发展的“短板”,提升中国顺应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硬实力”。

(4)以智能制造为先导积极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智能制造的发展能加快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进一步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促进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为此,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调整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由强调增长导向的规模比例关系向强调效率导向的产业融合和产业质量能力提升转变。要打破政府主管部门界限,突破只站在本部门角度思考产业发

展的思维定式,鼓励生产要素和资源跨部门流动,以智能制造发展和打造智能制造体系为先导,促进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和向服务业延伸,以服务智慧城市建设和智能制造发展为目标推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培育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业态。另外,由于总体上中国制造业处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信息化并存的阶段,不同地区、不同行业 and 不同企业的智能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此,要基于中国国情制定智能制造发展新战略。还有,可以借鉴日本“母工厂”做法培育智能制造新组织。智能制造具有技术集成特性和工程密集特性,需要一批能够明确提出先进制造系统技术条件和工艺需求、具备与先进制造技术相适应的现代生产管理方法和技能的“现代核心工厂”,这个“现代核心工厂”就是智能制造技术在企业组织层面进行应用、互动和持续改善的平台,而这恰恰就是日本的“母工厂”的定位功能。因此,中国需要借鉴日本“母工厂”做法,培育智能制造的“现代核心工厂”,奠定智能制造体系建设的高效工厂组织基础^[30]。

五、推进区域层面的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区域层面的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优化区域工业资源配置体制机制,促进工业生产要素跨区域的有效流动,化解工业资源配置在全球和地区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矛盾,提高工业生产要素空间上的配置效率,拓展工业发展空间。区域层面的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具体要和对外开放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相结合,一方面,这些战略的实施有赖于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赖于工业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有效流动;另一方面这些区域战略实施也极大地促进了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展了工业增长的空间。从国家角度看,区域层面工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涉及到深入推进“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等对外开放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下的区域工业生产要素配置问题;从各地区角度看,重点是推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与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实现工业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

1. 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中国工业产能合作和企业“走出去”,实现工业生产要素在全球有效配置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基于这个战略,中国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至少涉及65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覆盖约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从工业化视角看,“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表明中国这个和平崛起的大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在产生更大的“外溢”效应。我们的研究表明^[31]，“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之间的工业化水平差距较大,处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国家有1个,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国家有14个,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国家有16个,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的国家有32个,而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国家只有2个。其中有14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高于中国,有44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低于中国,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工业化水平处于上游的位置,按照“雁阵理论”,中国的工业化经验将对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拥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梯度优势产业类型,即技术密型产业(工业化后期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工业化中期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化初期国家)。按梯度转移理论,这意味着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产业合作空间巨大。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工业产能合作,重点推动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

程等领域的产能合作,通过“工程承包+融资”、“工程承包+融资+运营”、BOT、PPP、投资、工程建设、技术合作、技术援助等机制推动一批重点产能合作项目,形成若干境外产能合作示范基地和工业园区,培育一批工业产能国际合作的骨干企业。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工业生产要素的全球有效配置,也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对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意义巨大。“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全国各地进行有效对接,对全国各地工业经济发展也是巨大的发展机遇。

2.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实现工业生产要素区域间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构造区域工业发展新生态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旨在通过优化空间格局和功能定位、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构建一体化现代交通网络、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措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形成以首都为核心、辐射带动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发展的世界级城市群,这不仅可以创造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工业投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构造京津冀三地研发与制造产业链条,形成跨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工业生态系统。长江经济带战略覆盖全国11个省份,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连接起来,有利于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工业分工协作,形成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制造业协调发展带,有望形成若干符合《中国制造2025》战略方向的、世界级的、有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则旨在到2030年将东北地区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和重大技术装备战略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基地、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和重要技术创新与研发基地。这些大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既以工业生产要素有效配置为基础,也促进了工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正是这些区域层面的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抓手和服务目标。

由于各个省级区域资源禀赋、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历史沿革和文化习惯等的差异,在现有的行政管辖格局下,推进整体区域发展战略并不容易。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例,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工业运行数据表明,河北与天津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与其产业结构直接相关的。河北因钢铁产业占比“一柱擎天”,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整个工业增速受到严重影响。而天津2015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36.2%,高技术产业全年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13.8%,高于全国2个百分点,这样的产业结构支撑了天津仍能保持较高的增速。可以预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产业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相应的协同发展水平短期内难以迅速提升。因此,推进大的区域发展战略,要从长期着手,应该通过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体优化工业资源在各地的区域配置和产业价值链分工格局,提高供给要素质量,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逐步打造出工业发展的新产业生态系统。这要求,无论是处置“僵尸企业”、过剩产业“去产能”,还是房地产市场“去库存”,无论是利用金融创新“去杠杆”,还是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税费负担、财务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各方面“降成本”,以及发展先进制造业等高新技术产业“补短板”,都要在区域内将其整体作为一个产业生态系统考虑和规划。先从积极推进交通一体化建设入手,然后推进区域内产业对接和生态环境保护,最终构造一个新的工业生态系统。

3. 地区层面的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要充分考虑本地区发展水平和区域战略,体现地区的差异化特征

虽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都是针对由于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构性矛盾而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问题所进行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但是具体到各个地区,由于其发展阶段、基础条件、产业结构、资源禀赋、所有制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现会

有很大的区别,无论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还是“降成本”和“补短板”,具体的重点、对象、程度都会有很大差别。例如,从大的区域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问题就会不同,而不同城市也会有很大差别,资源型城市和制造业密集城市也不同。因此,各地区在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应该结合本地区基本情况,因地制宜,差异化推进。但是,这种差异化推进只是意味着尊重分工差异和本地比较优势,鼓励地方通过差异化的创新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真正的竞争优势,并不意味着可以以“补短板”的借口重新回到粗放经济发展的轨道上。

六、结语

在从实际推进角度对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论述以后,还必须回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上的本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意在于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通过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保证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稳定增长,所以,创新发展必然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首要发展理念。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坚持“人民本位”的创新发展理念;另一方面,要重视技术创新中的企业家的核心角色。企业家角色的核心内涵是创新,实质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从企业层面处置“僵尸企业”、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还是从产业层面化解产能过剩和实施《中国制造 2025》,以及从区域层面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新区发展战略,都要高度重视发挥企业家的核心作用,充分调动企业家创新积极性,政府在体制机制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 [1][美]曼昆. 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M]. 梁小民,梁砾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2]汤正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辩证论[J]. 区域经济评论, 2016,(3):11-14.
- [3]任红梅,岳宏志,马克思供给需求理论:一个文献综述[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5,(3):101-106.
- [4]杨沐,黄一义. 需求管理应与供给管理相结合——兼谈必须尽快研究和制订产业政策[J]. 经济研究, 1986,(2):12-20.
- [5]吴敬琏. 供给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J]. 中国改革, 2016,(3):26-28.
- [6]文建东,宋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16,(2):20-27.
- [7]陈小亮,陈彦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的关系探析[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6,(3):67-78.
- [8]余永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大杂烩[J]. 财经, 2016,(16):43-51.
- [9]张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四五”[N]. 京华时报, 2016-05-23.
- [10]刘霞辉. 实施供给侧改革 重启高增长之路[N]. 经济参考报,2016-05-09.
- [11]习近平.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10.
- [12]龚雯,许志峰,王珂. 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访谈)——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N]. 人民日报, 2016-01-04.
- [13]蔡昉. 认识中国经济减速的供给侧视角[J]. 经济学动态, 2016,(4):14-22.
- [14]蔡昉,都阳. 积极应对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过快上升问题[J]. 前线, 2016,(5):24-25.
- [15]白重恩,张琼.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世界经济, 2014,(10):3-30.
- [16]江飞涛,武鹏,李晓萍. 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5):5-17.
- [17]Cai, F., and Y. Lu. The End of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Perspective of Potential GDP Growth[A]. Garnaut, R., F. Cai, and L. G. Song. China: A New Model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 Canberra: ANU Press, 2013.

- [18]黄群慧,张航燕. 工业经济新常态愿景下的分化与突破——2015年工业经济运行特征与2016年展望[J]. 区域经济评论, 2016,(3):53-60.
- [19]黄群慧. 中国工业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寻求平衡[N]. 上海证券报, 2016-07-21.
- [20]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 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夏季报告(2016)[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21]黄群慧. 实质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N]. 经济日报, 2016-04-28.
- [22]何帆,朱鹤. 僵尸企业的识别与应对[J]. 中国金融, 2016,(5):20-22.
- [23]黄群慧,李晓华. “僵尸企业”的成因与处置策略[N]. 光明日报, 2016-04-13.
- [24]邹晨辉. 麦肯锡:中国超80%经济利润来自金融业[N]. 新京报, 2016-07-08.
- [25]张杰,杨连星,新夫. 房地产阻碍了中国创新么? ——基于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的解释[J]. 管理世界, 2016,(5):64-80.
- [26]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降低我国制造业成本的关键点和难点研究[J]. 经济纵横, 2016,(4):15-30.
- [27]黄群慧. 国有企业改革步入实质推进阶段[J]. 紫光阁, 2016,(6):46-47.
- [28]黄群慧.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制造业创新生态[N]. 光明日报, 2016-04-27.
- [29]黄群慧. 工匠精神的失落与重塑[N]. 光明日报, 2016-06-29.
- [30]黄群慧. 以智能制造为先导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N]. 光明日报, 2016-06-08.
- [31]黄群慧,韵江,李芳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On China Industrial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Front

HUANG Qun-hui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AS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hackles the logic of concept and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front, and holds that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front is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coping with low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aused by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of supply structure and demand structure, and which can be decomposed into “supply-side+structural+reform” corresponding to logical route of “question-reason-countermeasure”. Problem mainly exists in “supply-side”, the essence and source of problem is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and “reform” is countermeasu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structure, to analyz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front from three levels of enterprise,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can realize compromise of theoretical property, systematic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rom the abov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front on the basis of induction of industrial economic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2015 and the first half of 2016, and further from three levels of enterprise, industry and region, discusses the key task to advanc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front which aiming at disposal of zombie companies, reducing the manufacturing cost,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solving the problem of excess capacity, promoting “Made in China 2025” and “Internet +” strategy, promoting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and reg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northeast old industrial zone, etc.,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upply-side issu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reform policy

JEL Classification: O14 L60 O25

[责任编辑: 章毅]